

[德]康德 著 杨祖陶 邓晓芒 编译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

Kant Sanda Pipan Jingc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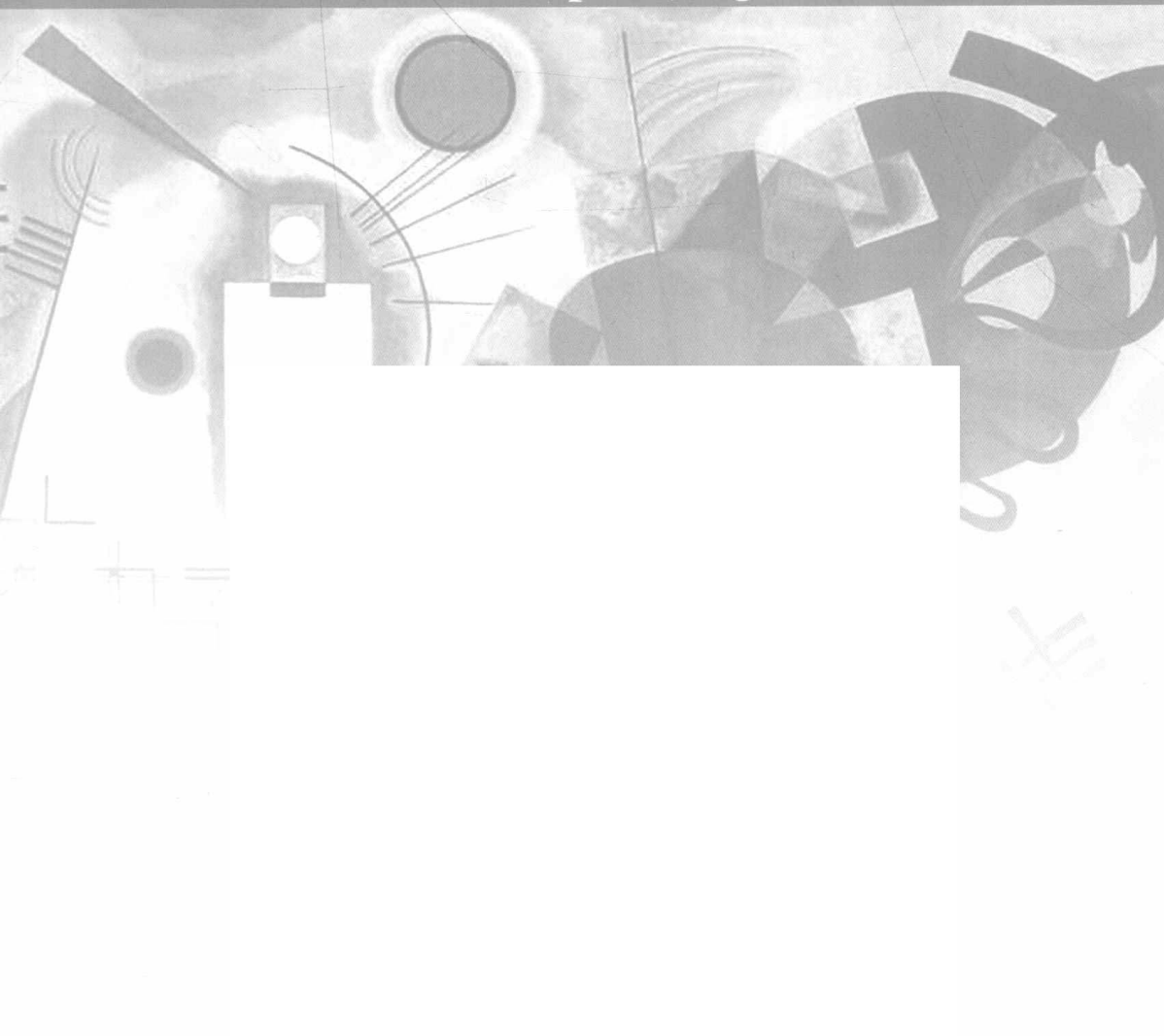
卷外卷

 人民出版社

[德]康德 著 杨祖陶 邓晓芒 编译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

Kant Sanda Pipan Jingcui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吴燕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德]康德 著;杨祖陶,邓晓芒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01-020006-4

I. ①康… II. ①康…②杨…③邓… III. ①康德(Kant, Immanuel 1724-1804)-哲学思想 IV. ①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7016 号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

KANGDE SANDAPIPAN JINGCUI

[德]康德 著 杨祖陶 邓晓芒 编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2.75

字数:528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20006-4 定价:8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编译者导言

一、康德的生平和著作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的伟大改革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在东普鲁士哥尼斯堡城一个马鞍匠的家庭里。他的双亲都是虔诚派的基督教徒。1732年,8岁的康德被送到培养神职候补人员的“腓特烈学校”接受神学和拉丁文的教育。1740年康德考入哥尼斯堡大学,在学习期间,除了哲学和神学科目外,他对自然科学越来越感到更大的兴趣,以致在1746年他就写成了一部理论自然科学的著作并将其付印。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去世了,康德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学校和出生的城市,到东普鲁士偏僻乡村担任家庭教师达9年之久。在这些年里,他不仅取得了教学经验,熟悉了社会和增加了生活阅历,而且利用空闲时间进行了大量的阅读、研究和写作,以致他1754年一回到哥尼斯堡就陆续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极有分量和价值的理论自然科学的论著。

康德回到哥尼斯堡的头等大事不在于发表他的成果,而在于实现他在大学执教的意愿。1755年4月他向哲学系提交了硕士论文《论火》,经过口试,获得了硕士学位。接着康德又提供了“取得大学授课资格论文”《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答辩后被授予讲师职称,即编制外(薪金由听课学生负担)的教师资格,从而登上了大学讲坛,开始了持续达40余年的教学活动。而他的这篇论文也就成了他对哲学的兴趣逐渐上升而超

过对理论自然科学的兴趣的标志。

1756年和1758年康德曾两次向当局申请递补教授职位,都因故未果。1766年康德兼任哥尼斯堡王家图书馆副馆长至1772年。1766年和1770年初爱尔朗根大学和耶拿大学先后聘请康德担任教授职务,他都谢绝了。1770年康德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哥尼斯堡大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编内正教授,这一任命由于他8月提出的就职论文《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通过答辩而生效。这篇著名的论文一般公认为标志着康德“前批判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终结和“批判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开端。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以崇高的责任感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从事于一种伟大的哲学改造工作,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脑力劳动,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批判哲学体系。与此相应,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过着一种独身的、高尚的和极其有规律的学者生活。随着康德的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在学术界支配地位的确立,他获得的光辉荣誉有增无已。1786年他被选为哥尼斯堡大学校长和柏林科学院院士,1794年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他的平静而有序的生活进程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仅有一次蒙上了暂时的阴影。1794年由于正统教会的仇恨,他受到普鲁士国王的申斥,而被迫答应不再对宗教问题发表意见。但国王一去世,他立即声明不再受诺言的约束,又在著作中谈论起宗教问题来了。1796年6月,康德讲了最后一堂课,1800年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1801年底退休,1804年2月12日因衰老去世。

教学活动是康德作为大学青年导师的重要活动,它占据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起初他每周至少要讲16—28小时的课,后来减少了也有14小时之多。讲授的课程从一开始就包括了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和数学,随后还开设了人类学以及矿物学等等。他的讲演,思想深刻而又机智风趣,充满激情而又循循善诱,引导人们去进行独立的思考。这些讲授在学生那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康德的影响不胫而走,远远地超出了大学校门之外。

著作活动是康德作为哲学家的最根本的活动,它在他一生中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前批判时期”康德著作的特色是:构思精巧,阐述明快,文字优雅有时甚至是华丽,理论性的论著中灌注着火热的激情,即兴式的创作散发着幽默的讥讽,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自然通史和

天体理论》(1755),《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1755),《自然单子论》(1756),《三段论四格的虚伪烦琐》(1762),《证明上帝存有的惟一可能的论据》(1763),《将负量引入哲学的尝试》(1763),《论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晰性》(1764),《对美和崇高的情感的观察》(1764),《以形而上学家的梦解释视灵者的梦》(1766),《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1770)在一定意义上也应归属于这个时期。

进入“批判时期”以后,康德著作的特色为之一变。它们作为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开辟新径和反复探索、艰苦思虑的成果,一方面是重大的主题,崭新的观点,深邃的思想,沉郁的信念,令人肃然起敬,玩味无穷;一方面是刻板乏味的结构,艰深迂腐的术语,冗长纠结的语句,晦涩枯燥的文字,令人望而生畏,难以卒读。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1781),《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786),《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1793),《永久和平论》(1795),《道德形而上学》(1797),《实用人类学》(1798)等。

二、康德的思想发展进程

与康德的平静而单调的外在生活相反,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近代各种对立的思潮相互激荡,思想风暴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思想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曲折反复,一旦形成了容纳百川的哲学智慧的海洋,新的思想潮流又在海底涌动兴起。现在让我们来鸟瞰一下康德的这种思想发展的历程。

1. 早期理论自然科学阶段(1746—1755)

从到大学求学之日起,康德就开始接触到了当时的各种思潮,从欧洲大

陆的理性主义到英国的经验主义,从对外界物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到对人类心灵的心理学分析,从托兰德肇始的自然神论到伏尔泰开端的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精神,所有这些都集中在康德的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通过他的老师克努真受到了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形而上学的教育和熏陶,通过另一位老师特斯克熟悉了牛顿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正是这两种对立思想体系的矛盾在康德早期的理论思维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康德确信只有形而上学才能为道德和宗教的信念提供确定性,因而一生都没有抛弃过形而上学,但莱布尼茨—沃尔夫式的形而上学由于脱离现实、空洞无物和学究式的烦琐,进步知识界已是敬而远之,康德对它的兴趣也就越来越小;与此相反,他对牛顿的自然哲学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几乎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去。他1746年完成的处女作《对活力的真实估量的思想》就是企图对笛卡儿派和莱布尼茨派有关测量动能的争论作出裁决。这位大学生在序言中宣称,在科学的法庭上,决定性的不是权威和人数,而是理性的命令,任何权威和成见一旦有碍于指示真理就应当抛弃。这就是他要同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以及沃尔夫、伯尔努利等大思想家、大学者进行较量甚至反对他们的理由。青年康德就是以把哲学、科学上的权威和定见都送上理性的法庭来决定对它们的取舍这样一种启蒙的、批判的精神,走上理论思维的历史舞台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康德最伟大的理论自然科学著作是他1755年出版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或根据牛顿定理试论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虽然康德对牛顿的自然哲学有着最深刻的信念,但他不赞成或反对牛顿以上帝的安排和第一次推动来说明诸天体的完善结构和协调运动,而主张以自然的原因,即以原始物质(原始星云)本身所具有的两种对立的力——斥力和引力的相互作用来说明这一切。这样,他就提出了近代第一个有科学根据的宇宙自然发生、发展的学说,它们展示的宇宙观不仅是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神学目的论的宇宙观的直接对立物,而且也与牛顿的一经被推动就永远不变的僵化的机械论的宇宙观根本不同,它有力地促进了近代辩证法的宇宙观的形成。不过,为了使自己的以牛顿力学为依据的宇宙发展的科学假说同自己的哲学良心、即对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形而上学的信念相协调,康德最

后还是以某种自然神论的形式把原始物质归于上帝的创造,把物质本身的规律归于上帝的意志,把宇宙诸天体的协调一致归于上帝以此为目标所设计的万物的本性。

康德在这个时期的许多论文对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和贡献,其中包括他提出不可量物的假设的硕士论文《论火》。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兴趣在康德以后的著作活动和教学活动中都还有明显的表现。

2. 前批判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1755—1770)

康德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从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理性主义的独断论向其对立面经验主义的独断论转化、而又回到包含有某种“批判”思想萌芽因素的理性主义的、但仍然是独断的认识论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

(1)在康德成为大学哲学教师,哲学逐渐成为他主要的研究对象以后(1755—1760),他就不能不郑重地思考他在其中成长起来的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形而上学和他深深信奉的牛顿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无条件地相信纯逻辑的概念思维与现实的存在及其规律间的一致性的独断论之上的,而牛顿的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则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无条件地相信经验思维、即通过经验获得的概念与现实的存在及其规律之间的一致性的独断论之上的。这两种认识论和独断论是直接对立、彼此矛盾的。康德这时对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独断论虽然抱着批判的态度,但总的说来他是站在这种形而上学的立场,企图找到某种观点来调和它和牛顿自然哲学的矛盾。在1755年取得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则的新解释》中,康德提出,在运用充足理由律于自然事物时,必须区别存在的理由和认识的理由,或实在的基础和逻辑的基础;在运用于人的行为时,则必须肯定承认行为有充分理由(根据)和人的意志自由并不矛

盾。康德的这个“新解释”实质上是对沃尔夫把充足理由律归结为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就莱布尼茨本人而言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从而从逻辑上去推论实在和从思维去推论存在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和独断论的批评和否定,在康德往后思想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在康德调和对立两派的动机的支配下也可能发展出我们认识的世界和真实存在的世界、必然的世界和自由的世界是不一致的思想。这一倾向在次年提出的申请教授职务的论文《自然单子论》里就有了显著的表现。论文的主旨是用牛顿的物理学来改善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为了调和莱布尼茨和牛顿在空间理论上的矛盾,康德引进了在古希腊人那里通行的现象和本体(物自体)的划分的概念,认为现象必须从物理学上来研究,物自体则必须从形而上学上来认识。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从此以后一直贯穿在康德哲学思想中,尽管在如何划分和划分的意义上各个时期和阶段上的解释很不相同。在1759年的《试对乐观主义作若干考察》一文中,康德仍在坚持和宣扬莱布尼茨的这一观点:我们这个世界是上帝选择的他所创造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而在这个前定和谐的最好世界中个人毫无价值。这表明康德还在做着理性主义的“独断论的迷梦”。

(2)进入60年代,康德的哲学思想发展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就是从理性主义的“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开始批判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独断论,企图通过从经验获得的概念来与现实及其规律建立联系(1760—1766)。如果说在这以前,发现了“自然的本性”的牛顿对康德的影响最大,那么现在,如火如荼的法国启蒙运动则将一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首先是发现了“人的本性”的卢梭推到了康德的面前,卢梭成了康德所最崇敬的“第二个牛顿”。卢梭对于康德的深远影响是多方面的,其聚焦点则是卢梭关于人之为人、人的最可尊贵之处在于人的自由主动者资格的思想,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康德的人生观、知识观和价值观。正如康德自己说的:“卢梭纠正了我,我意想的优点消失了,我学会了来尊重人,认为自己远不如寻常劳动者有用,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权利。”^①与此同时,

^① 转引自诺曼·康蒲·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绰然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9页。

休谟的经验哲学对理性主义及其形而上学的深刻有力的批判,使康德最终觉悟到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基于对牛顿经验自然科学的信念,企图沿着经验主义的道路来改善形而上学的基础,但他在这道路上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与此相矛盾的因素,即经验的界限问题。

在1762年的《三段论四格的虚伪烦琐》这本小册子中,康德将作为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形而上学支柱的形式逻辑称作“泥足巨人”,并且提出和思考了概念如何起源于感性观念或如何把经验引入哲学的问题。在次年的《证明上帝存有的惟一可能的论据》一文中,他批判了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关于上帝存有的本体论证明,认为从观念推不出存在,当然经验也不能对此作出证明(这就是经验的界限),惟一可能的证明就是上帝不存有是不可想象的,这实际上是康德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诉诸伏尔泰、特别是卢梭所主张的人对神和正义的信念有“天然情感”的一种表现。在同年的论文《将负量引入哲学的尝试》中,他继续发挥了《新解释》提出的实在基础和逻辑基础有区别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进而同意了休谟对于理性主义者有关因果关系可以分析地(逻辑地、先天地)予以证明的驳斥,认为从“因”的概念不可能逻辑地推出其“果”的概念,同样地,从“果”的概念也不可能逻辑地推出其“因”的概念。在1764年出版的著作《论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晰性》中,康德对理性派、特别是在沃尔夫那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所谓哲学研究中的“几何学方法”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康德指出,哲学和数学是两门性质完全不同的科学,因而研究的方法也完全不同。数学是数量的综合科学,它建构数量,从下定义出发而不需要经验,依赖于感性的活动。与此相反,哲学是概念的分析科学,它必须接受概念,探索定义,因而需要经验,依赖于知性的活动。因此,哲学为了认识现实,绝不可模仿数学的建构方法,而是应当使用牛顿在自然科学中使用的方法,即在可靠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去探求普遍的规律。但是,康德认为经验虽是真理、知识的基础,却不是善、道德的基础,必须把真和善、知识和道德区分开来。在这里又出现了经验的界限问题。循此前进,到1776年发表的著作《以形而上学家的梦解释视灵者的梦》中,康德就把理性主义的思辨的形而上学家比之于搞与精灵交往骗术

的“视灵者”，他们的区别只不过是“理性的梦幻者”与“感性的梦幻者”的区别，前者的要害正在于他把自己的思想当作事物的真实秩序。康德因此而发出了将经验作为哲学的根本的呼吁。但是在这里又出现了经验的界限，因为康德认为由于我们的感觉系统里缺少有关的感觉，所以灵魂或心灵本身、即精神实体是经验所达不到的。

这样，在康德那里，沿着经验主义方向以改进形而上学的思想发展已达到了最高点，与此同时经验主义所必然导致的、威胁着形而上学的存在的怀疑论因素（表现为一系列经验的界限）也有了充分地暴露。对于抱着真诚而深刻的形而上学信念的康德来说，一个大的思想转折和反复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3）这个大的转折就是，康德彻底觉悟到，为了挽救和改进形而上学，经验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而必须走一条新的、他当时还只是朦朦胧胧看到的“批判”之路（1767—1770）。这是由于康德在那里发现了理性的二律背反现象，即理性在有关世界整体的问题上总是提出两个互相冲突而得不到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并为此争论不休。他认识到这种现象来源于理性想“在感性世界里寻找无条件者”，可是感性指向的只是现象，而不是物自体；而想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形而上学正是理性的这种迷误的一种表现。在探究二律背反及其消除的途径的过程中，康德重温了休谟在因果性问题上彻底贯彻经验主义所达到的对于经验主义本身的否定。休谟证明，我们在关于现实的知识中所使用的因果联系的结构形式并不是知觉给予的，在知觉中根本不存在这种联系，相反，它是我们的联想机制或习惯的产物，没有任何证据、包括经验的归纳在内，可以用来证明它同现实有关。休谟的结论是，以经验为依据来断定因果联系的客观性，正如以对概念的逻辑分析为依据来做出这样的断定一样，都是一种无根据的、不值一驳的独断或武断；对因果联系的客观性我们必须在实践上抱有信念，而在理论上则只能抱存疑的即怀疑主义的态度。对休谟论证的反复思考使康德完全中断了在经验主义基础上改进形而上学的梦想，并且更清楚地意识到了经验主义必然导致有害于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怀疑主义。所以，康德在1783年发表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谈到，一方面肯定是理性的二律背反现象有力地把他从

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去从事理性的批判；一方面（在序言中）又指出正是对休谟的“回忆”首先打破了他的（经验主义的）独断论的迷梦，并给予了他在哲学研究上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不过休谟给予他的方向只有否定的意义，即“不能走经验主义的方向”，而肯定意义的方向倒是在1765年出版的休谟的对手莱布尼茨同另一位经验派代表洛克论战的巨著《人类理智新论》中找到的。莱布尼茨在书中提出，观念、真理、知识原则早已作为潜能而存在于人心，它们在经验和知识中起着感觉不到的现实作用，并具有自己的贡献，同时由于经验提供的机缘，它们通过我们对内心的反省而被认识到。在莱布尼茨这个所谓“潜在天赋性”思想的启示下，正在寻找新方向的康德开始从知识区分为形式和内容出发，考虑在人类认识能力（感性、知性和理性）中是否早已潜在着知识的形式，它们作为认识活动的规律而使经验、知识、科学成为可能。他在1768年的《论空间方位区分的基本原理》中就首先对空间概念作了这样的理解：它不是思维的或逻辑的结构，而是感性知觉的普遍基础，它第一次使事物及其各种空间关系成为可能。

由以上各种因素而引起的康德哲学思想上的大转折，他自认为是在1769年完成的^①。他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在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中，以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情，粗线条地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如下：

事物区分为现象和物自体（本体），人类的认识能力区分为作为接受性能力的感性和作为自发性能力的知性。感性认识的对象是现象，它的先天知识形式是时间和空间，对空间和时间的反省产生数学这门先验科学。知性的先天知识形式是一般概念（即后来的范畴，当时还不成其为系统）；凭借知性形式的逻辑运用对通过时空得到的知觉的加工改造，产生关于现象的必然的知识，即经验的自然科学；通过知性形式的实在运用，即用于物自体，则产生与物自体相适合的知识，即形而上学这门先验科学。知性之所以能产生形而上学，是因为知性和事物本身都根源于上帝，因而通过知性就能

^① 参见福伦德尔：《康德的生平和著作》，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汉堡1977年版，第251页。

够如马勒伯朗士所说的“在上帝身上”认识事物本身^①。

由此可见,就论文认定知性可以认识物自体(本体)和知性与物自体一致的根源在于某种上帝的“先定和谐”而言,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仍然是立于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形而上学和独断论之上的,因而还是属于康德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但是,就论文的根本要求是划分感性和知性,主张两者具有在功能和范围上各自都不相同的先天形式而言,这个体系的核心确超出了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形而上学和独断论的视野,因而超出了康德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正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和它的框架之间的这个矛盾把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从前批判时期推进到了批判时期。

3. 批判时期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1770—1800)

批判时期康德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充满探索性和创造性的矛盾进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批判哲学的奠基阶段;批判哲学体系的建成阶段;后批判哲学体系阶段。

(1) 批判哲学体系的奠基阶段(从“就职论文”到《纯粹理性批判》的问世,1770—1781)。

“就职论文”发表不久,康德就计划将其扩充修订为一部较大的著作,其第一部分将是他拟订的一门独特的、走在形而上学前面的预备学科——“一般现象学”,它“规定了感性原则的效力和范围”,以免它们“搅混了关于纯粹理性的对象的判断”,也就是“使真正的形而上学避免感性存在物的混入”^②。不到一年,他就把这部著作命名为《感性和理性的界限》^③。又不到一年^④,他发现在自己的构思中“还缺少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即忽视了明确

① 参阅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69—670页。

② 1770年9月2日致约·亨·兰贝特的信,见《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8页。

③ 1771年6月7日致马·赫茨的信,同上书,第30页。

④ 1772年2月1日致马·赫茨的信,同上书,第32—34页。

地提出和解决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来自心灵本身的纯粹知性的概念和原理何以和经验、物、事物本身是一致的,或这种一致的根源何在?这个问题康德后来将其经典化为“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更一般地说,这个问题也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康德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揭示形而上学的全部秘密的钥匙。因为由此就可以“规定出形而上学的本性和界限”;而在解决这个问题、即在规定认识的起源和有效性时,无论是求助于上帝的直接影响还是求助于其“前定和谐”,“这种急救神是人们所能选定的最荒唐不过的东西”。这样,他就否定了“就职论文”所匆匆忙忙地建立起来的认识论体系的框架,而我们看到,这种否定乃是那个体系的核心——知识形式的先天性的思想所发展出来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这时,康德以为他已有足够的准备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写出一部《纯粹理性批判》,其第一部分是关于理性认识的本性的,它包括形而上学的本源、方法及其界限,估计大约3个月内即可出版。但是,出乎康德意料之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不得不进行一场以发展认识的主体能动方面为中心的真正的哲学革命,不得不进行范围广阔的探索和反复的尝试,以至于从这时算起,他也花了八、九年的时间才完成和出版了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为中心的《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划时代的巨著。

在这个过程中,康德逐步形成了改革形而上学的指导思想或纲领。这就是:形而上学必须从研究的程序和内容上区分为有内在联系的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批判人类一般认识能力,即“纯粹理性”,判定各种先天知识的来源和限度,以确定形而上学是否可能,以及其所以可能的源泉、条件和范围,这部分是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或未来形而上学成为可能的条件,康德称之为“纯粹理性的批判”或“形而上学的导论”;随后一部分是阐述从已经判定的纯粹理性的概念和原理中引申出来的全部纯粹理性的哲学知识,即由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组成的形而上学体系,康德称之为“纯粹理性的体系”或“形而上学本身”。康德认为,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是以往和当前的哲学家都没有想到过的、关系到形而上学生死存亡的最艰巨复杂的任务,是他必须首先全力以赴的、决定一切的工作。

必然与自由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一直盘旋在康德心中的主题。在推动

他去进行理性批判的诸二律背反中,他特别强调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纯粹理性的批判”应当为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提供最重要的理论前提和基础。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个纯理论问题,而在康德看来却是一个“人人都关切的”大问题。因为自然必然性是近代新兴自然科学的基础,意志自由则是道德的基础;而自然科学又是征服自然以增进人的福利即幸福的前提,幸福与道德的和谐统一则是人类理性最为关切的最高理想和最后目的(“至善”)。因此,对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探究在康德那里就扩大为对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职责和最终命运的探究。由此出发,他把他要在思辨哲学里长期探索的问题概括为:1.我能知道什么? 2.我应作什么? 3.我可以希望什么? 他认为,“我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回答其余两个问题的基础,作为“形而上学导论”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彻底的、详尽无遗的回答。

康德起初也是遵循亚里士多德的范例,将人类心灵的活动二分为理论(认识)活动和实践(意志)活动,认为它们都是在理性的统率下进行而各有其理性的原理。为了判明这两种活动的理性原理,按照康德的观点,必须首先批判地考察作为人类一般认识能力的理性,一方面判明理性作为区别于感性的高级认识能力究竟有哪些成员、它们各自的功能及相互关系,一方面判明认识的原理及其范围;而这样一来就为进一步判明心灵的实践活动的理性原理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所以,在1772年第一次提到打算写的名为《纯粹理性批判》的这部著作时,他把研究“理性认识的本性”以判明认识的原理作为必须先写出的第一部分,而把研究“实践知识的本性”以判明“德性的纯粹原理”作为待写的第二部分^①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这一年起,康德开始每年都要讲授一次“人类学”,在这里他终于把人类心灵的活动或相应的能力三分为认识、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欲望(意志),虽然他直到《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后都还认为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没有普遍必然的理性原理。但是这个三分模式对于后来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即“纯粹理性批判”体系的划分和完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指导性和权威性的参照

^① 见1772年2月1日致马·赫茨的信,《康德书信百封》,第34页。

系,甚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对人类一般认识能力的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则不仅为判明道德的理性原理、也为判明情感的理性原理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从而为批判哲学体系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2) 批判哲学体系的建成阶段(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判断力批判》,1781—1790)。

康德在第一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之后,并没有马上去对实践理性、即理性的实践使用进行批判。虽然在理论上他认为很有必要进行这种批判,以确定欲求能力的理性原理、即道德原理,但他却又认为,就实际而言,似乎又没有这种必要,因为道德原理连最普通的人类知性也都很容易理解。这样,他一方面要为《纯粹理性批判》的辩护、解释和完善进行大量的工作(1783年出版《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7年出版《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另一方面则要为在形而上学的这个“导论”的基础上建立道德—自然的形而上学体系作准备(1785年出版《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6年出版《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可是他所提出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及其和《纯粹理性批判》的关系却受到了许多批评和责难,这使他意识到必须立即着手对自己的道德原理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论证,为此就必须对实践理性进行一番类似于纯粹理性的批判那样的批判。1788年他就发表了他的第二批判即《实践理性批判》。

在完成第二批判时,康德一方面认为,由于心灵的两种能力、即认识能力(理论活动)和欲求能力(实践活动)的先天(理性)原理及其运用的条件、范围和限度的确定,似乎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已达到了系统的完整性,从而给作为科学的道德—自然形而上学体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深深地意识到两大批判所揭示的两大先天原理在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之间掘下了一条将两者分开的鸿沟,必须有某种中间环节把这两个彼此对立的领域联结起来,使从必然向自由、现象到本体、理论向实践、知识向道德的过渡成为可能。他认为这个中间环节只能是他所提出的心灵能力或心灵活动的三分模式中居于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之间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能力。这样一来,康德就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一方面他不得不否定他以前一直肯定的情感没有理性(先天)原理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解决到哪里去

找这个先天原理的问题。康德认为,在人类的高级认识能力(一般理性)中,是判断力把知性和(狭义的)理性联结起来的,第一批判确定了认识的先天原理是知性所提供的,第二批判确定了道德的先天原理是理性所提供的,所以,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的先天原理就只能到判断力那里去寻找,为此就必须对判断力进行批判的考察。而这样批判考察的结果,就是1790年出版的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它标志着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的系统完成,也就是由三大批判构成的批判哲学体系的建成。

(3)后批判哲学体系阶段(从《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到《实用人类学》,1791—1798)。

在《判断力批判》架起了从自然到自由的桥梁之后,康德就有条件和基础来回答他所提出的“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个问题了。从1792年起就陆续写作和发表、到1793年才完整出版的《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和答案。由于康德在这里把历史上产生的基督教及其教会的发展和向着一种理性信仰的宗教及其团体前进,看作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理想得以接近于实现的现实道路,从而过去少见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因素就渗透到康德的这部著作中来了,这一趋势在他往后有关社会、政治、法乃至道德的著作中就更其明显了。当然,在康德看来,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而是批判哲学对于从现象的观察引出现象的规律的认识原则进行反思的原则所要求的。它绝不意味着批判哲学体系的观点、形式和基础有任何改变或需要任何改变。这是康德直到最后所公开声明的深刻信念。^①

但是,另一方面,在批判哲学体系的这种似乎是量的扩张之下,却孕育着某种新质的东西。在完成了批判哲学体系和回答了“我能知道什么”、“我应作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大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对自己长期哲学探索的回顾和总结,1793年康德在一封信中列举他长期研究所要解决的那三大问题后,补充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②在大约

^① 见“1797年8月7日关于与费希特知识学的关系的声明”,《康德书信百封》,第248页。

^② 《康德书信百封》,第200页。